



愛、中國——基督教中國化的側影

吳梓明 香港宏恩基督教學院

吳梓明：
愛、中國——基督教中國化的側影

引言

《愛——來自中國》(*From China, With Love – The Personal Letters of Bishop and Mrs. Logan Roots, Two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1900-1934*)，這本書是一位美國傳教士的

女兒，為父親整理他的私人信函而寫成的一本書。她的父親是吳德施 (Logan Roots) 主教，吳德施主教是 1896 年來華傳教，1905 年獲晉升為主教，至 1938 年退休回國。因著基督的大愛，感召吳德施來到中國，將基督的福音傳給中國人民；也是因為愛，吳牧師（後來稱為主教）願意

奉獻他的一生，在中國服務長達 42 年。為什麼說是：《愛——來自中國》呢？原來在吳主教的心中，還有另一份特別的愛——是主教與他妻子之間的愛。因著這份愛，吳主教夫人願意與主教分隔八千里，雖是身處美國、卻是每天以禱告支持在中國宣教的吳主教。也是這份的愛，將吳主教與他的夫人結連在一起，所以每當主教寫信回家的時候，下款便寫著：《愛——來自中國》

(*From China, With Love*)。

在主教的信函中，見證著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吳主教的信函，處處流露出基督的愛，是上帝透過他的生命將基督的大愛傳達給中國人民；也是因為基督的大愛，讓吳主教成為了中國人民的朋友。^[1] 記得有一次，筆者參觀武漢市共產黨

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的博物館時，看到一幅兩個人的合照，下款寫著：「周恩來與他的外國朋友」，細看之下，發現這位外國朋友就是吳德施主教，這張照片現在仍是放在八路軍的博物館內。原來吳主教也是周恩來的好朋友，吳主教的兒子約翰·羅茨 (John Roots) 曾在 1972 年以記

摘要：近年中國學者在談論「基督教中國化」時，亦有不少是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發表客觀、科學及具建設性的研究文章，譬如：張志剛的〈基督教中國化的三重視野〉和卓新平的〈中國基督教「愛的神學」及其社會關懷〉等。「基督教中國化」，當然也包括「基督教教育的中國化」，從吳德施主教一生在中國服務的經驗，我們發現，基督教不僅是愛的宗教，最落地的「中國化基督教教育」原來就是「愛的教育」。在本篇文章中，筆者嘗試重新檢視一位近代中國教育家所倡議的「愛的教育」的概念，發現陶行知所主張的「愛的教育」不僅是與基督教的信仰有著某種思想淵源、它更也是致力開拓一種適切中國現實社會處境的中國化「愛的教育」、為「基督教教育中國化」開拓新的思維和啟迪。
關鍵詞：基督教中國化；基督教教育；愛的教育；愛 中國；吳德施主教；陶行知

者及朋友的身份返回中國、訪問周總理，回美國後撰寫了一本《周恩來傳》，並於 1978 年出版，扉頁上題詞曰：「獻給我的父親吳德施 (主教)」。^[2] 吳主教回美時，曾將他在中國服務多年的信函帶回家，他的女兒 (Frances Roots) 亦將這些珍貴的信函整理成書，是：《愛來自中國——美國傳教士吳德施主教與夫人的私人信函》^[3]，書中滿載著吳主教對妻子和中國的愛。

近年中國學者在談論「基督教中國化」時，亦有不少是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發表客觀、科學及具建設性的研究文章，譬如：張志剛的〈基督教中國化的三重視野〉、卓新平的〈中國基督教「愛的神學」及其社會關懷〉、和唐曉峰的〈我關於「基督教中國化」的幾點認識〉等^[4]。「基督教中國化」，當然也包括「基督教教育的中國化」，從吳德施主教一生在中國服務的經驗，亦可以讓我們重新發現，原來「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最落地的「中國化基督教教育」就是「愛的教育」。在本篇文章中，筆者將嘗試從一位近代中國教育家所倡議的「愛的教育」概念，闡明它委實是「基督教教育中國化」的一個具體個案。

陶行知與愛的教育

陶行知 (1891-1946) 是近代中國一位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改革開放以來，亦有不少學者是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影響的。^[5]不過，較少學者會留意到陶行知其實也是一位華人基督徒教育家。^[6]筆者嘗試開拓一個新的視域，是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重新檢視陶行知的生平事蹟、發現他在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思想中如何孕育出「愛的教育」概念來。

陶行知出生於 1891 年，自少接受傳統私塾教育，他在 15 歲的時候接觸基督教——進入內地會創辦的「崇一學堂」；18 歲考入南京「匯文書院」，該書院在 1910 年改名為「金陵大學」，陶行知於是成為金陵大學首批畢業生之一。在大學期間，陶行知受到幾位傳教士教育家的影響——包括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亨克教授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1876-1963)^[7]和詹克教授 (Jeremiah Whipple Jenke, 1856-1929)，尤其是詹克教授所寫：The Social Principles of Jesus (《耶穌的社會原則》) 一書。^[8]陶行知回憶說：「雖然我不能很仔細講書中那些教導是最重要的，但我可以說，耶穌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我 (因此) 就決志成為了基督徒了」。^[9]

陶行知大學畢業時，正值辛亥革命、中華民

國剛剛建立，所有中國年青學子都是要「讀書為救國」的年代，陶行知亦積極面對這個「救中國」的處境。畢業後，他獲得一個獎學金，便選擇往美國伊利諾大學修讀政治學，準備學成回國為新政府服務。不過，1915 年夏天，他在美國日內瓦湖畔參加了青年會 (YMCA) 舉辦的夏令會，他決志轉向教育，認為教育才能改變國家的未來。當時夏令會的目的是要呼召年青的學生獻身讀神學、返回中國做傳教士、教會牧師等；但陶行知卻是相信他應該轉讀教育、要透過公立教育——面向全中國、才能救國。他隨即在 1915 年 9 月轉往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學的博士學位，成為了杜威 (John Dewey)、和孟祿 (Paul Manroe) 的學生、也是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10]

1917 年，陶行知獲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博士之邀請，回國在南京師範學院教授教育學、教育史、教育心理學等。翌年獲升任為教務長，同時他亦參加了中華教育改進社、協助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 (1868-1940) 推動新中國教育的改革，1921 年開始一系列的教育改革運動，包括「平民教育運動」、「農村教育運動」、「普及教育運動」、「生活教育運動」、「小老師教育運動」、「民主教育運動」、「創意教育運動」等。^[11]陶行知更獨力主張「平民教育」、和「愛的教育」，致力為中國教育創造另一種新文化運動。

「愛的教育」來自基督教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兼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周洪宇教授^[12]特別尊崇陶行知，更尊稱他為「近代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13]周教授縱然是多次斷言陶行知只曾一度是基督徒、後來卻放棄了基督教信仰，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陶行知「愛的教育」的理念是來自基督教的信念的。周教授直言：「他 (陶行知) 後來所奉行的『愛滿天下』及其偉大的犧牲精神，就與基督教的博愛主張和耶穌『捨己為人』的救世精神有著某種思想淵源。」^[14]他亦補充說：「陶行知之所以被人民所長久崇敬，原因之一是他具有偉大的人格風範，而這一人格風範的塑造又顯然是離不開基督教信仰



所起的作用」。^[15]周教授還加上一句，說：「他（陶行知）的一生，是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一生，也是為『愛滿天下』而奮鬥的一生」。^[16]國內的學者雖然並不認同基督教，卻也不得不承認在陶行知身上可以見到基督信仰的影兒。

在《開拓與創建》一書中，周洪宇教授亦明確地建議學者應採取一個跨文化的視野角度來探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他勉勵學者們應該「把陶行知作為近現代中國的一個文化巨人來認識他……（這樣才可以落實地）來研究陶行知對文化的貢獻以及對後來新中國文化建設所產生的積極影響、來體現陶行知作為 20 世紀綜合的文化偉人對中國以至世界文化教育所作出巨大貢獻和所產生的積極影響」。^[17]在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洽上，周教授當然不會忽略基督教信仰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響。

華中師範大學研究所副教授唐文權先生亦曾撰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金陵大學：青年陶行知人生奠基所在〉，在文章中，他指出早年的陶行知在金陵大學讀書的時候，也確實是受到一些傳教士教育家的影響。^[18]原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孟祿 (Paul Monroe, 1869-1947) 教授曾揚言：「中國『王學』（即王陽明學說）甚好，在美國亦有相似的哲學，是杜威一派的實驗主義、即注重實行之哲學，與王學知行合一之說相同」。^[19]孟祿將王陽明學說與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相提並論，引起了中國教會大學的傳教士教育家們對王陽明學說也刮目相看，司徒雷登亦坦言王陽明是他自己「特別喜愛的一位哲學家」；金陵大學的另一位教授亨克先生更將《王陽明哲學》一書翻譯成英文、宣揚「王學」。^[20]而陶行知不僅是在金陵大學讀書時受到了司徒雷登和亨克兩位教授的影響、熱衷「王學」，更也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時，剛巧就是孟祿和杜威的學生，難怪他終於成為了杜威和王陽明學說的專家，更是將基督教的「道學」與王陽明的「王學」和杜威的教育哲學結合起來。^[21]

談及陶行知的為人，唐文權亦直言：「（陶行知的一生是）在『去偽立真、自我道德修持』的過

程中，真誠地向《聖經》借取了精神力量，而在親朋的心目中，他也是一位有著宗教般犧牲精神的人。……（他舉個例子說）在陶的兒子的回憶中，二十年代家中客房的牆上掛有一張耶穌像，『表示我們大家對於耶穌捨己為人的自我犧牲精神的景仰』。^[22]唐文權還總結說：「陶行知……熱心任事、勇毅不屈、無私無我，『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和『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走』，這樣感人至深的道德風範和人生信仰就是熔鑄了中外古今的優良素質而成的」。^[23]換言之，陶行知「愛的教育」理念背後也必定是隱藏著耶穌「捨己為人」的自我犧牲精神的。

「愛的教育」就是「基督教教育的中國化」

陶行知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做研究時最後撰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在中國的道德與宗教教育〉 (*Moral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n China*)。^[24]原來陶行知在博士研究最關心的問題是：「基督教教育如何能夠在中國實施？」陶行知十分熟識中國的文化處境，也理解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因此他認為基督教教育若要在中國推行的話，必須要從中國的處境、從「道德教育」開始。^[25]陶行知相信中國人所需要的「教育」，並不是西方（特別是以希臘文化為基礎）的形而上學、比較抽象的哲學神學的思維、及西方的神學家所談論的宇宙論、三一論、基督論、救贖論等宗教課題。反之，中國人最關心的卻是道德教化、倫理、和人際關係的問題。換言之，中國化的基督教教育並不是「全盤西化照搬過來」的西方基督教教育，而應該是從中國處境所關注的「道德教育」開始。這也該是陶行知後來在中國提倡「愛的教育」理論的基礎吧。^[26]不過，當談及道德教育之時，陶行知仍然是補充了一些基督教的元素在內，他所主張的「愛的教育」便是一個好的例子。譬如：在陶行知撰寫的同一篇文章中，當他談及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的時候，他引用了耶穌的榜樣，說：「耶穌確是一位好牧人、他能夠達到『道德自主』的最高境界；因為好牧人為羊捨命、耶穌能夠謙卑自己、回應及服從上主的吩

咐」。^[27] 他亦引用耶穌在《聖經》裡所說的一句說話：「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約翰福音》第10章18節），這就是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陶行知不僅是確認了耶穌是基督教教育的一個典範人物，更是可以為中國的道德教育樹立了一個真實的典範，因為耶穌能夠達到「道德自主」的最高境界。^[28]

返國後，陶行知在1927年創辦了一所實驗師範學校，是「曉莊師範學校」。曉莊學校不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卻是注入了基督教信仰的一個重要的元素：「愛」的教育。「愛的教育」就是「基督教教育」的中國化，它不單只能夠融入中國的教育文化內，更能夠將教育的涵意不斷地提升。陶行知曾直言：「曉莊是從愛裡產生出來的。沒有愛便沒有曉莊。因為他（曉莊）愛人類，所以他愛人類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中華民族；因為他愛中華民族，所以他愛中華民族中最不幸的農人。他愛農人是從農人出發，從最多數最不幸的出發，他的目光，沒有一刻不注意到中華民族和人類的全體。……曉莊是從這樣的愛心裡出來的……愛之所在即曉莊所在」。^[29] 曉莊的教育理念最具體的表現是在陶行知的一句名言：「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走」。^[30] 「曉莊是從愛裡產生出來的」，這樣的教育思維是從那裡來的？若是按照中國傳統的教育文化而言，它不會是來自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或是當代的社會主義；「愛的教育」就是一種新的文化思維。陶行知也肯定是熟識基督教《聖經》的教導，如《新約聖經》也有這樣的一句話，說：「愛是從神而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約翰一書》第4章7-8節）。陶行知還極力主張「愛滿天下」。事實上，他之前所主張的生活教育、農村教育、平民教育等都是從「愛的教育」延伸出來的，而他的教育理想就是「愛滿天下」。換句話說，「愛的教育」就是道德教育的靈魂，它也委實是「基督教教育」中國化的最具體表現。

在民國初期，亦有不少中國的知識分子（如胡適、陳獨秀等）特別尊崇西方文化、包括西方

的科學與民主、並主張中國的改革必須要「全盤西化」，陶行知卻有另一套的看法。陶行知在美國接受教育時，是杜威的學生，所以他已學會了甚麼是「進步的教育（實驗主義和重視民主的教育）」、「以學生為本的教育」、「教育是為生活」、「教育是為成長」等最先進的現代教育理念；但他卻並不是完全認同可以照搬「全盤西化」的一套教育哲學來中國的。

為了適應中國社會的教育處境，陶行知主張必須修正西方的杜威式的教育思維。因此，當杜威主張「教育即生活」時，陶行知卻是主張「生活即教育」。^[31] 對陶行知來說，「教育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生活、教育的活動也必須是由日常生活開始、要用生活的問題作為教育的課題和內容」。^[32] 陶行知所提倡的「生活教育」就是「在生活裡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而教育」（英文可翻譯為“education of life, for life and by life”）。^[33] 另一方面，當杜威主張「學校即社會」的時候，陶行知卻是說：「社會就是學校」。兩者有甚麼不同呢？陶行知解釋說：「當我們說『學校即社會』時，就像是將一隻活潑可愛的小鳥從天空中捉下來、放在一個鳥籠裡；然後將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放進籠裡，要它學習在籠子裡生活。籠子裡生活並不能完全等同外邊世界的生活、它甚或可以是『弄假』和『不真實』的」。^[34] 「學校即社會」就是這樣；但若是說「社會是學校」，情況就會截然不同了。「社會就是學校」是要將籠子裡的鳥放回天空中，讓它任意飛翔，也是讓孩童回到自己的生活環境、接受教育，這樣的教育才是孩童真正需要的教育。^[35] 換言之，陶行知希望他所推行的「愛的教育」不是抽離中國的現實社會、而是真正適切中國處境的教育模式。

為何陶行知想跳出杜威的教育思維？陶行知的修正思維其實也可以說是從基督教《新約聖經》學回來的；原來耶穌的教導也是一種屬於「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教育模式。當耶穌訓練他的12個門徒時，他們並沒有固定的學校、「社會就是學校」；耶穌是在加利利海旁、湖邊、在岸上或在船上教訓門徒的。換言之，「社會就是學校」。另一方面，「生活即教育」，即是



現實的生活就是施教的內容及目標，譬如：耶穌的學生彼得是在打魚的時候被呼召做門徒的、他是在耶穌教他打魚的時候發現自己是個罪人、隨即歸信基督的；當耶穌呼召彼得和安德烈的時候，耶穌是說：「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便立刻捨了網、跟隨了耶穌（《馬可福音》第1章17節）。這些都是「教育即生活」、「社會就是學校」的典範。基督教的信仰的確是幫助了陶行知從一個不一樣的角度認識世界、更可以超越一般學校教育的理論、尋覓創新的思維。^[36]這也引證了早前唐文權所說：「（陶行知）真誠地向《聖經》借取了精神力量」。^[37]另一方面，陶行知能夠跳出杜威的教育思維，亦證實了唐先生所說：陶行知是受到基督教道德教化的同時、也保留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在面對西方思想的沖擊時，他仍然能夠自豪地稱自己是「最中國化的留學生」。^[38]

陶行知確是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因為他曾被金陵大學兩位教授（司徒雷登與亨克）、和當代新儒家思想所吸引、醉心於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他甚至將自己的名字改變了，本來是稱為「陶文濬（浚）」、卻自1911年起改為「陶知行」，以表明他並沒有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仍然是堅守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不過，陶行知也曾嘗試優化王陽明的學說。

王陽明的「王學」是主張「知行合一」的學說，但陶行知應用在學校教育的範疇時卻是主張「教學合一」，隨後他更進一步提倡教育應是「教學做合一」（即「教、學、做」三者結合為一）。^[39]因為陶行知發現了：「一切的生活和教學都必須是從『做』開始的」—「活一天、『做』一天」、「『做』是行動、是思想、是新價值之產生……『做』是發明、是創造、是實驗、是建設、是生產、……是探尋出路」。^[40]這就是「教學做合一」的意思；後來，到了1934年（陶知行43歲）時，他更將自己的名字由「陶知行」改名為「陶行知」。^[41]為甚麼要從「知行」改名為「行知」？就是因為他發現了，「教、學、做」三者之中，「做」是最為重要，他說：「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比如種田是要在田裡做的、必須在田裡學、在田裡

教」。^[42]從那時候開始，他已不再是追隨「王學」所主張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卻是反過來主張「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了。^[43]換言之，陶行知也是嘗試從一個較為創新的視角、突破中國「王學」的傳統思維、要為中國教育文化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來。從另一個角度看，陶行知所主張的是要更符合中國化的處境，要從實際生活的處境中去思考教育的問題。

結語

對中國的傳統教育來說，陶行知「愛的教育」的主張可算是一種另類的道德教育、或者只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另類教育「結晶品」。今天又如何？在本篇文章開始時，筆者提及卓新平教授在〈中國基督教「愛的神學」及其社會關懷〉（2010）文章中曾坦言：「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國傳播的過程……出現了『愛』的缺失或遮蔽……因而也不可能使其宗教成為中國社會普遍接受或認可的信仰」。^[44]不過，卓教授接著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階級鬥爭』的觀念逐漸從主流意識形態中淡出，『和諧』、『和合』則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建設的主旋律和發展主流……『愛』的觀念慢慢被人們發現和關注……」（他還指出，）在改革開放的當代發展中，基督宗教也有積極的表現和主動的參與，其指導觀念則是基督宗教思想中『愛人如己』的核心價值」。^[45]周洪宇教授亦在2011年出版的《開拓與創建》一書中，更進一步建議學者們應採取一個跨文化視野的角度來探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46]他說：「（應該）把陶行知作為近現代中國的一個文化巨人來認識他……來體現陶行知作為20世紀綜合的文化偉人對中國以至世界文化教育所作出巨大貢獻和所產生的積極影響」。^[47]周教授所言十分正確。綜觀陶行知的一生，我們發現他是身處在中、西不同的文化之間，他的偉大的地方是在於他能夠跨越中西文化、在中西文化之間致力尋找一條創新的出路，透過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洽上，創新一種綜合世界文化的結晶品來。「愛的教育」就是一個具體的例證。

陶行知所主張的「愛的教育」和「愛滿天下」的教育理念是中國基督教教育的現代版。「愛的教育」表面上看是來自基督教教育，但陶行知卻將之變成為中國化的基督教教育。在他創辦「曉莊師範學校」之時，陶行知直言：「曉莊是從愛裡產生出來的。沒有愛便沒有曉莊。因為他（曉莊）愛人類，所以他愛人類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中華民族；因為他愛中華民族，所以他愛中華民族中最不幸的農人。……曉莊是從這樣的愛心裡出來的……愛之所在即曉莊所在。」^[48]這就是中國化的「愛的教育」，也是較容易為中國人民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

另一方面，陶行知並沒有否定中國的文化傳統，從他所改的名字（不論是「知行」或是「行知」），也可以知道他始終如一是王陽明學說的追隨者。正如唐文權所說：「陶行知以『知行』為名 23 年，復以『行知』為名 12 年……，整整 35 年中，『知』、『行』二字與他須臾不離，儘管翻覆變化，卻始終是他立身行事的準則」。^[49]不過，陶行知的第二次改名，亦表明他不是盲目地追隨「王學」，當他發現了「教學做」三者之中，「做」是最為重要之時，他便將「王學」修正了，不再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是變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了。^[50]換言之，陶行知敢於嘗試創新視角、突破「王學」的傳統思維、要為中國教育文化尋找新的思維，更符合中國化的處境。

為了適應中國教育的社會處境，陶行知主張也須修正西方的杜威式的教育思維。就是這樣的原因，當杜威主張「教育即生活」時，陶行知卻是主張「生活即教育」。^[51]對陶行知來說，「教育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生活、教育的活動也必須是由日常生活開始、要用生活的問題作為教育的課題和內容」。^[52]陶行知所提倡的「生活教育」就是「在生活裡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而教育」。^[53]另一方面，當杜威主張「學校即社會」的時候，陶行知卻是說：「社會就是學校」。陶行知解釋說：「當我們說『學校即社會』時，就像是將一隻活潑可愛的小鳥從天空中捉下來、放在一個鳥籠裡；然後將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放進籠裡，要它學習在籠子裡生活。籠子裡生活並不能完全等同外

邊世界的生活、它甚或可以是『弄假』和『不真實』的」。^[54]「學校即社會」就是這樣；但若是說「社會是學校」，情況就會截然不同了。「社會就是學校」是要將籠子裡的鳥放回天空中，讓它任意飛翔，也是讓孩童回到自己的生活環境、接受教育，這樣的教育才是孩童真正需要的教育。^[55]換言之，陶行知希望他所推行的「愛的教育」是真正適切中國現實的社會處境、是中國化的「愛的教育」。

總而言之，陶行知所倡議的「愛的教育」不僅是與基督教信仰有著某種思想淵源、也不單是在中西文化之間尋求和創造綜合世界文化的結晶品。事實上，陶行知所推行的「愛的教育」也是屬於另一種創新的嘗試，要為中國的道德教育開拓了一種真正適切中國現實社會處境的中國化「愛的教育」來。若是從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角度看，「愛的教育」或許也可以是一個具體的個案，為未來的「基督教教育中國化」研究開拓更多更新的思維和啟迪來。

[1] 參閱陳忠：〈中國人民的朋友——吳德施主教〉，載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 18 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年）。

[2] 參 John McCook Roots. *Chou: An Informal Biography of China's Legendary Chou En-lai*, (New York: Doubleday, 1978).

[3] 參 Motoko Fujishiro Huthwaite & Frances Roots Hadden: *From China, With Love – The Personal Letters of Bishop and Mrs. Logan Roots, Two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1900-1934*. (Norwalk, Connecticut: East Bridge, 2010). Frances Roots Hadden 就是吳主教的女兒，另一位作者：Motoko Fujishiro Huthwaite 是主教女兒的好朋友，是一位日本記者，最終於 2010 年為她完成全書的出版工作。

[4] 文章見載於張志剛、唐曉峰（主編）：《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年），相關頁數可參閱該書目錄。舉個例子，卓新平〈中國基督教「愛的神學」及其社會關懷〉一文是從歷史與文化的角重新檢視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更提出了：「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國傳播的過程……出現了『愛』的缺失或遮蔽……因而不可能使其宗教成為中國社會普遍接受或認可的信仰」，第 13 頁。



- [5] 譬如：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科學研究在 1980 年代初主編了六卷《陶行知全集》，1985 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後來在 1991 年增補了兩卷、共八冊）；四川教育出版社亦在 1991 年出版另一套共 10 卷的《陶行知全集》（四川版），（亦分別在 1998 年及 2002 年增補了兩卷、共十二冊）；又可參閱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陶行知教育文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 年）出版等。
- [6] 關於陶行知基督徒身份的考證，可參閱何榮漢：《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發現》（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4 年）。
- [7] 亨克是在金陵大學研究「王陽明學說」的先導者之一，他曾翻譯了《王陽明哲學》一書，亦曾於 1911 年應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之邀請介紹有關王陽明的生平和哲學思想，論文亦獲該會刊登之，可參閱 Henke, Frederick Goodrich: "A Study in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Wang Yang Ming,"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4, (1913), pp. 46-64; and also Henke,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 Ming*.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16.)
- [8] 參 Jenks, Jeremiah W.: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Jesus*, (New York: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MCA, 1906).
- [9] 參陶行知 1912 年 12 月的〈信仰自述〉（英文稿：Wen Tsuing Tao, "The Testimony (in part) of Tao Wen Tsuing, College Student, University of Nanking, December 21, 1912"）中，見載於何榮漢：《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發現》（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4 年），〈附錄一〉，第 302-303 頁。
- [10] 同上，第 121-159 頁。
- [11] 譬如參：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陶行知教育文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 年）。
- [12] 周教授是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是國內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史的專家，中國陶行知研究學會副會長，重要著作包括有主編：《陶行知教育學說》、《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及著有《開拓與創建——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文化》一書。他在國家中亦是一位受到相當重視的學者、教育領導，他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亦是人大常委會的副主任、全國人大代表；教育部國家督導團專家組成員、及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
- [13] 參周洪宇：《開拓與創建——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文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15-16 頁。
- [14] 同上，第 36 頁。
- [15] 同注 [13]，第 36、70 頁（同一章內重覆說了兩遍、亦屬不簡單的）。
- [16] 同注 [13]，第 68 頁。
- [17] 同注 [13]，第 13-14 頁。
- [18] 參唐文權：〈金陵大學：青年陶行知人生奠基所在〉，刊載於章開沅等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339-357 頁。
- [19] 同上，第 352 頁。
- [20] 司徒雷登和亨克均是金陵大學研究王陽明學說之先導者，讀者可參閱司徒雷登著、陳麗穎譯，《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2 年）（原作出版年：1954 年）；及 Henke, Frederick Goodrich: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 Ming*,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16)。
- [21] 同注 [18]，唐文權在其文章中亦指出：縱然陶行知承認自己在金陵大學求學時是受到不少基督教道德教化（「道學」）的影響、並於 1913 年成為基督徒，但他也坦言自稱是「最中國化」的留學生，可參閱該文，第 355 頁。
- [22] 同注 [18]，第 356 頁。
- [23] 同上。
- [24] 文章分兩期在《留美青年》(Liu Mei Tsing Nien) 3:1, Nov. 1916, 23-32 及 3:2, Jan. 1917, 66-73。陶行知本是打算返國後才完成他的博士論文：〈中國教育哲學與新教育〉的撰寫，可惜稿子在 1920 年一場意外火警中被燒毀掉，後來上海聖約翰大學於 1929 年頒發給他一個榮譽理學博士學位。他是名符其實的一位博士，而這篇〈在中國的道德與宗教教育〉便成為了他在美國讀博士做研究期間唯一的學術論文、亦可以顯示出他在其後的博士論文中所尋覓的新教育必定是與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有關的。
- [25] 同注 [18]，第 355 頁。唐文權在該文章中亦指出：陶行知在金陵求學時受到的基督教道德教化，是包括「基督教要人：去偽心、存真心、自我犧牲、愛人如己」等。
- [26] 亦可參閱 Peter Tze Ming Ng: "Education of Love and Humanity: Dialectics at Work between the Global and Local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 Ng, Peter Tze Ming et al (eds.) *Christian Mind in the Emerging World: Academic Faith in the Asian Context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8) pp.41-67.
- [27] 同上，第 54-55 頁。
- [28] 同注 [26]，第 54 頁。亦可參閱余子俠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陶行知卷》，第 463-496 頁。
- [29] 參陶行知：〈曉莊三歲敬告同志書〉，載《鄉村教師》1930 年第 9 期。轉載自文明國主編：《陶行知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 年），第 13 頁。
- [30] 同上，第 13 頁。
- [31] 參陶行知：〈生活即教育〉，刊載於中央教育

科學研究所編：《陶行知教育文選》，第 109-116 頁。

[32] 同上，第 109 頁。事實上，這亦是近代學者所主張中國學問不是「記誦之學」、而是「踐履之學」的意思，參李慎之：〈中國哲學與廿一世紀〉，刊載於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 21 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33] 參陶行知：〈生活即教育〉，刊於《陶行知教育文選》，第 109-116 頁。英文翻譯本見刊於 Xie Ailei & Gerard A. Postigline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elected Papers by Tao Xingzhi on Education*. (Leiden/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6) pp. 9-15。

[34] 同注 [29]，第 13 頁。

[35] 同注 [29]。

[36] 參注 [26]，第 53 頁。

[37] 同注 [18]，第 356 頁。

[38] 同注 [18]，第 355 頁。

[39] 參陶行知：〈教學做合一〉，載《陶行知教育文選》，第 76-78 頁。

[40] 同上，第 77 頁。

[41] 同注 [18]，第 354 頁。唐文權亦指出：『陶行知以「知行」為名 23 年，復以「行知」為名 12 年，也就是說，從 1911 年到 1946 年去世，整整 35 年中，「知」「行」二字與他須臾不離，儘管翻覆變化，卻始終是他立身行事的準則』。

[42] 同注 [36]，第 77 頁。

[43] 參陶行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載《鄉村教育通訊》1928 年卷 2 第 1 期，亦見載《陶行知教育文選》，第 74-75 頁。

[44] 同注 [4]，第 13 頁。

[45] 同注 [4]，第 14 頁。

[46] 參周洪宇：《開拓與創建——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文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13-14 頁。

[47] 同上。

[48] 同注 [29]。

[49] 同注 [18]，第 354 頁。

[50] 同注 [43]。

[51] 同注 [31]。

[52] 同注 [31]，第 109 頁。事實上，這亦是近代學者所主張中國學問不是「記誦之學」、而是「踐履之學」的意思，參李慎之：〈中國哲學與廿一世紀〉，刊載於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 21 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53] 同注 [33]。

[54] 同注 [29]，第 13 頁。

[55] 同注 [29]。

Love-China: A Side-view on the Sinification of Christianity

Ng Tse Ming, Peter (Gratia Christian College)

Abstract: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sinification of Christianity from the cultur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such as Zhang Zhiguang and Zhuo Xinping. The life of Bishop Logan Roots sets a good example of loving China from the personal letters between the bishop and his wife during 1900-1934. And the present paper presents another example from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of love by Tao Xingzhi during the early 1920-1940s in China. The author then proceeds to suggest that Tao's attempt of "Education of Love" would give great insights to the re-thinking of Sinification of Christina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Sinification of Christianity, Christian Education, Education of Love, Love China, Bishop Logan Roots, Tao Xingzhi